

# 社科院：中拉整體合作 乃華全球戰略「必選項」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本周開啓對巴西、哥倫比亞、秘魯、智利四國的正式訪問，有望與拉美國家簽署數百億美元的投資計劃。中國社科院近日發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4-2015）》指出，儘管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未將拉美涵蓋在內，但中拉整體合作規劃的精神實質和主要內容與之相通。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玉潔



該報告認為，中拉整體合作的國際意義在於，中國政府針對當前全球經濟有效需求不足和流動性過剩兩大挑戰，率先轉向需求潛力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通過打造「包容性發展」的多邊合作機制，順應全球生產價值鏈重組和「南南合作」的歷史趨勢，客觀上將加速自身經濟結構和模式轉型，並帶動未來世界經濟增長。

據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拉動拉美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報告指出，隨着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中國政府和企業也對資源豐富、市場廣闊的拉美地區更加青睞。從中國的域外整體合作機制的全局設計來看，中拉整體合作是中國全球戰略中的「必選項」。

提升中拉產能合作水平，是李克強此次出訪的重點之一。國研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全國政協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丁一凡（見圖）向本刊表示，合格的勞動力是實現工業化的前提，拉美國家加強與中國產能合作、承接中國產業轉移，亟需提升國內基礎教育水平。

## 丁一凡：拉美需改善基礎教育

「為什麼中國的工業化進行得比一般發展中國家都好，特別是當中國打開國門吸收外國資本後，眾多大型跨國公司願意到中國投資，在很大



目前中國是拉美第二大貿易夥伴國。圖為在巴西聖保羅，民眾參觀展出的中國某品牌汽車。

新華社

程度上並不是因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低，而是勞動力水平高。」丁一凡說，現在中國對拉美國家的投資主要是農業開發、礦業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真正的工業產業轉移並不多，其主要原因在於勞動力水平制約。為此首先要加強的是拉美國內基礎教育，讓勞動力成為生產線上的合格工人。

中國前駐玻利維亞、巴哈馬、哥倫比亞大使吳長勝亦表示，拉美是中國出口商品的重要市場和投資的重要目的地，也是重要的資源和能源的進口來源地。「此次訪問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雙邊經貿合作還處在戰略機遇期，要抓住機遇，尋找開闢新的合作領域和項目。而中拉在產能方面，互有優勢，互有需求，互為機遇，此訪將會在中拉產能合作方面提出新思路新舉措，在雙邊在產能合作方面進行探索，達成一些合作項目並簽訂協定。」

## 港委員冀首都機場更人性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王頌）近期，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北京師範大學宇一藝術研究院藝術總監劉浩眉（見圖）向本刊記者表示，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客流吞吐量排名全球第二位，而在使用中發現，首都機場仍存在開車進入機場登記或出機場上車路長且非常不便、旅客直梯擁擠但扶梯利用率不高等問題。她建議多措並舉，使首都機場更加人性化、合理化。

### 大廳到停車樓 設施有待提升

在劉浩眉看來，首都機場T3內部井然有序，已和國際接軌，不過在配套設施完善方面仍存在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比如從到達大廳到停車樓的區域，就有些不盡如人意之處。

「旅客進、出機場如使用停車場，都要經過長長的通道，在標識不清的情況下，需繞過無數車輛和人流，攜帶所有行李經過露天，穿過馬路，才能到達目的地。這段路程要走十餘分鐘，這對於老人、殘疾人等都是較困難的事情。」劉浩眉說。

她又指出，在航班到達的高峰期，大量旅客前往停車樓時，四部直梯前常會擠滿旅客，但電梯廂一次僅能容納約4台行李推車。「電梯門一開，人們就推車往裡擠，一些外國旅客被迫往後讓。首都機場是國際大型機場，出現這些不文明行為，會令國人形象受到損害。」

### 優化停車樓 便利旅客人群

對此，劉浩眉提出四項建議：一是優化停車樓中央區，合理佈局停車位，為行李多的旅客提供便利，可根據情況確定上下車的位置；二是旅客可預約免費電瓶車，將行李運至停車位，讓老人、婦女等優先排隊；三是設置一些人性化的進出通道，保障需扶助人群能免受干擾、快速出站、入站。四是在到達大廳出口至停車場樓之間的通道安裝遮風擋雪的頂棚，以便行人橫過馬路。

## 許進籲為全體抗戰英雄授勳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頌）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9月3日抗戰勝利日亦首次被列為公眾假期。全國政協委員、清大建築規劃建築設計研究院副院長許進在今年兩會期間遞交提案，建議向為抗日戰爭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的英雄授勳。

### 讓民族英雄業績永載史冊

許進從小在祖父、九三學社創始人許德珩「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熏陶下成長。他表示：「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以國為重、挺身而出、保衛家園、視死如歸的戰士和民眾是民族脊梁，是民族英雄。他們的業績永載史冊，精神萬古長存。我們永遠緬懷、銘記他們。他們的精神不斷地激勵我們振興中華，追逐中國夢。」

許進說，去年8月他曾前往雲南騰沖拜謁抗日烈士陵園。在那裡他聽到一種說法：「抗戰初期我們每消滅一個日本兵要犧牲十名士兵，但到了滇西戰場我們犧牲一個士兵可以消滅七個日本兵，在緬甸戰場我們犧牲一個士兵就消滅十個日本兵……」。

許進決定為抗日老戰士做些事，隨即遞交提案，建議向為抗日戰爭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的英雄授勳；向參加抗日戰爭的全體官兵頒發紀念章；優撫健在的、曾經參加戰爭的老兵。

### 授勳範圍應涵蓋各個方面

許進建議民政部修訂抗日軍人撫恤優待條例並督促各級政府落實好條例的內容，讓健在的、為數不多的抗日戰爭老英雄、老戰士有尊嚴地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他表示，授勳的範圍可在民政部2014年9月1日公布的，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的基礎上補充調整，增加為抗戰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的、沒有犧牲的將領和其他人士。

他認為，頒發紀念章的範圍應涵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個方面，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等武裝力量，國民黨抗日將士，民主人士等。同時，應關注從海外回國參加抗戰的僑胞以及援華國際武裝力量和國際友人。

## 香港「基本法」第一次確定「雙普選」目標

齊鵬飛



### 專家看香港政改（五）

我們再看第二個重要的「歷史關節點」，即1990年的香港「基本法」。香港回歸以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不僅要搞民主選舉，而且要逐步發

展到「雙普選」這一步的長遠目標，是中央政府領導和主導制訂的「一國兩制」的「大憲法」——香港「基本法」第一次明確下來的。目前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它最初的、也是唯一的憲制基礎和法理根據，就是來自香港「基本法」，而不是其他。

而且，中央政府為了體現在香港回歸以後在香港特區推行和落實民主政治、民主選舉的誠意和決心，在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附件二以及與香港「基本法」同時公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的辦法的決定》中，對香港回歸以後「頭十年」也就是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長官和第一、二、三屆立法會的產生，如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逐步增加民主成分最終走向「雙普選」的長遠目標，進行了非常具體的規定，規劃和設計了一個非常具體和明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 中央信任港人可管理好新香港

「頭十年」過後怎麼辦？香港「基本法」沒有也不可能規劃和設計得那麼遠，但有一個非常具有開放性的指引。「基本法」附件一規定：「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附件二規定：「2007年以

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式，如需對本附件的規定進行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這充分表達了中央政府對於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時代，在香港特區發展民主政治的堅定信心和對已經「當家作主」的香港同胞可以管理好、發展好、建設好新香港的高度信任。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補充說明：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中，中央政府和各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達成了高度共識——回歸以後香港特區的民主政治建設及民主化進程，必須遵循以下一些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一是必須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必須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二是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三是必須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見《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

這些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構成了香港「基本法」的重要立法原意。從以上有關香港「基本法」對於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具體規定，我們可以得出非常明晰的一個歷史結論：香港回歸以後香港特區民主政治的建設和發展，

最根本的憲制基礎和法理根據就是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中央政府就是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之總體方案及其「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設計者、發動者、主導者、推動者和監督者，也就是我們通常理解的「總設計師」和「總監理師」。

### 不斷有內外力干擾政制改革

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特區的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香港特區的民主化進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援和積極推動下，在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基本上是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設計藍圖，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決定之規定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向着「雙普選」的既定目標逐步發展的。

但是，令人非常遺憾的是，香港回歸以後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的道路荊棘重重。不斷有來自歷史的、現實的各種因素，有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力量干擾、衝擊和破壞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決定之規定的基礎上向前推進的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這種非常不正常的情况，在2003年香港特區「七一遊行」以後日益凸顯出來。（作者係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